

# 古城雄关起宏图

庄晏成 许在全 张敬尊

在祖国东南海疆的崇武半岛，巍然屹立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石头古城。历经六百年的风雨，犹如长虹横亘大地，雄峙东溟，与台湾隔海相望，显示其与天地长存的雄伟气魄。这座崇武古城，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保卫祖国、抗御外患的巨大作用，历来受到人民的重视和称颂。因此，它不仅是惠安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福建人民乃至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今年中秋佳节，泉州市各界将隆重举行“崇武古城创建六百周年纪念活动”，探讨古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交流有关闽台关系的研究成果，总结宝贵的历史经验，探索崇武古城的开发利用。这对于促进整个历史文化名城泉州的振兴，促进侨乡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促进实行对台“通商、通邮、通航”和祖国统一，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六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崇武古城六百周年的历史积淀却是一笔不可忽视的文化遗产。它是一座古代劳动人民构筑的历史丰碑，凝铸着数十代人艰辛创业的经验，为后人继往开来、奋然开拓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崇武古城，建于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位于泉州东北48公里的崇武半岛上。城墙用花岗岩石砌成，全长2455米，城墙高达7米，堪称一座气势磅礴、雄伟壮观的东海长城。长城，是中华民族崛起的象征，也是炎黄子孙的意志和伟大的象征。举世闻名的中国万里长城，是秦始皇集中中国的人力、物力，把原有的秦、燕、赵之长城加以增补修筑起来的。二千年来，它被当作中华民族的象征而扬名于全世界。国际友人和海内外同胞无不把

长城作为圣地，并从中获得巨大的鼓舞力量。坐落于祖国东南门户的海疆重镇的崇武古城，虽然就其规模、气势而言，不能与万里长城相比拟；然而崇武古城作为一座海上长城，它的崔巍坚固，它的建筑特色，以及它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又可说是与万里长城一脉相承、交相辉映。值得指出的是，海疆雄关崇武古城，只动一方之众，举一隅之力，竟能完成如此巨大浩繁的国防防御工程，并且在抗御倭寇等反侵略斗争中发挥过巨大战斗作用，这确实是令人惊叹的奇迹。

“海天南望战尘收，漠漠平沙罢唱筹。”面对这座矗立于山海之间的崇武古城，不由把人们的思绪引回到600年前的明代。当时，出身于行伍的朱元璋，南征北战，削平群雄，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天下初定。这位开国皇帝登上宝座之后，清醒地意识到“创业难，守业更难。”天下甫定，但不是没有麻烦的事，居安必须思危。在他的心目中，重要的事莫过于修边设防，以固基业。因此他北修长城，南建海城，大大加强了防御力量。如果说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有功，历代王朝都修过长城，此中有秦长城、汉长城、明长城。而明代所建的长城，其历史功绩堪与秦长城、现长城媲美而毫不逊色。以明洪武五年所建的嘉峪关为例，它号称“天下雄关”，完全可以与“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并驾齐驱。嘉峪关位于祁连山和马鬃山之间，是长城南端的隘口，丝绸之路的咽喉。该城巨檐凌空、气势峭拔。顺着古时“马道”登上城楼，便可以看到瓮城、罗城，光化门、柔远门、关楼、角楼等雄伟建筑，逶迤起伏，错落有致，布局不凡，是中国古代防御体系的系统工程。

既然明王朝已经完成了北边的防御工程，南边又有波涛万里的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为什么要在福建沿海荒僻的崇武半岛上筑起这座古城呢？只要看看崇武古城的建筑，从城墙、窗铺、门楼、月城、墩台到捍寨、演武厅，结构严谨，布局完整，适应于当时的军事需要，这就足以表明崇武古城是作为朱元璋的国防工

程的一部分而修建的。对当时的历史进行全面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崇武古城并非孤悬于海。公元1387年，朱元璋派江夏侯周德兴经略福建，北起崇武，中有永宁、金门、厦门，南至铜山（即今东山），共修建了近20座沿海古城，筑起了一条新的海上长城，互为犄角，遥相呼应，对当时的国防起了重大作用。明代在福建沿海构筑的一座座各具规模的长城，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因此，今年纪念崇武古城六百周年，也可以说是纪念福建沿海古城建城六百周年，实际上是对六百年来福建沿海人民为保卫国土、抗御外患、保卫家乡、建设家乡所建树的历史功绩的缅怀和纪念。

我们知道，古代人类的活动受到自然条件的种种限制，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活动的范围日益扩大。到了明代，浩瀚的大海已经不是人们不可逾越的天然障碍了，相反地，造船技术的发达，使人们利用海洋作为发展对外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桥梁。到了14世纪，人的活动天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人们过着男耕女织、自供自给的小农生活，生活范围比较狭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的活动天地不断拓展，到宋代泉州刺桐港已经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贸易关系，海上交往十分频繁。明朝时，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向海外扩张了。因此，明王朝注重海上防御，这一战略转移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六百年的历史经验证明，面向海洋是正确的。六百年来，世界上许多纷争大多发生在海上。特别是明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福建沿海处于战乱频繁的多事之秋，如果没有修建沿海防御工程加以防卫，拥有漫长海岸线的八闽海疆将会动荡不安，混乱不堪。因此，六百年前创建的崇武古城和沿海诸城历经岁月的风雨依然完整地保存至今，以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受到后世的瞻仰和赞颂。

历史的发展犹如奔腾不息的大海，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越来越广阔的天地。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证明：海域，

在沿海国家的建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要发展沿海区域的经济事业，其沿海突出部的建设是不容忽视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继沿海14个城市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又把闽南三角区作为经济开发区。从党中央这一战略部署来看，崇武到东山一带的沿海古城，其战略地位就愈发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其开拓发展的结果，当然不是军事城堡的重建，而是一批经济繁荣的沿海城镇的崛起。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世界经济中心已经从西欧逐渐向太平洋地区转移。无论国内国际的形势，对历史古城的发展都极为有利，而它们对于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繁荣也将日益产生重要作用。同时，从这些沿海古城走向世界的炎黄子孙数以千万计，他们的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与崇武、东山等古城隔海相望有一千多万台湾同胞，海峡波涛拍岸之声时时触动着他们的思乡怀土之情，他们渴望着骨肉同胞聚首团圆，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有一首台胞辗转寄回崇武故乡的诗：“故国仍云海、关山雪未消，卅年游子恨，何日贾归桡。”深切地表达了对祖国和故乡的思恋。从这个意义上说，崇武古城已经不是一般的历史遗址，而是联系海外侨胞和港台同胞的桥梁，是唤起游子爱国爱乡、思亲怀土的望乡城。

经受过历史上烽烟战火洗礼的崇武古城，早已治愈了自己身上的累累伤痕，变得更加雄伟壮观、绚丽多姿。如今，这里的农业、渔业和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充满生机。独具技艺的手工业，特别是石雕工匠，已经繁衍成为一支闻名全国的建筑大军，他们的足迹遍布北国南疆，汗水洒遍神州大地。作为一座历史城垣，崇武古城对于中外游客也是富有迷人魅力的。登上崇武古城观览晨曦中舟船竞发、晚霞中归帆如织的美景，确实令人心旷神怡；

而崇武一带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风情，也给人们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深刻印象。崇武已经成为我省的渔业基地之一。古港湾内，经常可以看到前来停泊避风、修机的台湾渔船和登岸观光、探亲的台湾渔民。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崇武将成为镶嵌在祖国东海之滨的一颗明珠，闪耀璀璨夺目的光芒！

## 建设崇武，促进闽台“三通”

田富达

适逢崇武古城建城六百周年之际，我作为一个台湾高山族人受邀参加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讨论会，感到十分荣幸和十分亲切。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向崇武镇的各界乡亲致以热烈的祝贺！主人举办这次重要的讨论会，特别将祖国的统一大业这样一个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都非常关切的重大问题列入议题，我们由衷地感谢！

闽台两省渊源久远，高山遮不住，大海隔不开。崇武港作为这一亲厚关系中的重要一环，在历史上起过应有的作用。崇武本来就是一部分台湾省人的桑梓故园。据记载，在明末清初即有崇武人定居台湾。如现在的基隆港窟仔底“大岞新村”聚居渔民一百多户，他们的祖籍是崇武镇大岞村；淡水八里温地区的“港墘四房村”，也是崇武港墘村张姓四房的人家迁台定居的，这个村庄抗日战争前就已有近二百户的规模。听说，台湾桃源县有个溪底村，系崇武溪底、五峰二村名工巧匠的后裔，抗日战争时期有百八十户人家。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和各地的汉族、高山族居民一起对开发和建设台湾，密切闽台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崇武与台湾历来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崇武的渔业早就十分发达，是闽南主要渔港之一。

据载，崇武早在元明年代，造船业已相当发达，在明末清初已能制造“轻便而易动，且坚致可驾远而耐风浪”的渔船，<sup>①</sup>此船经常往来崇武与台湾之间。明末崇武诗人黄吾野有诗云：“津临晋水终朝路，海接东南一夜舟”；“击楫日通彰化米，敲针冬钓坎门鱼。”确切地记录了这一段史实，说明了闽台之间、崇武与台湾各地之间的以渔业为媒介的经济贸易和通航往来之密切关系。

崇武曾经对繁荣海峡两岸关系的经济交流起过作用。台湾制造业过去就比较发达，而资源极为缺乏，大陆则有丰富的资源，但加工制造业不能满足广大市场需要。而崇武港则是闽台经济往来中十分重要的口岸之一。因此，我国历代中央政府、福建省政府和各地商户，非常重视崇武港，认为她是对台贸易往来合适的港口。嘉庆十年，惠安县正堂钱塘吴忠在《募修崇武所城序》一文说：“查崇武澳为商船渡台捷径，”<sup>②</sup>决非虚誉之词，确是历来的定评。

崇武和台湾文化交往也极为密切，崇武的建筑艺术享誉台湾，并且被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遗产加以引用。据历史记载，台湾各地常请崇武著名木匠、石匠到台湾帮助建筑和传艺。清末，台北重建万华龙山寺，就是请的崇武溪底村名匠王益顺、王红两位师傅前去设计、施工。据说庙中殿拜亭独特的“蜘蛛结网式藻井屋架，”是崇武溪底木匠的祖传绝技；而庙门前的盘龙、石柱等石雕工艺，则出自崇武五峰村名匠蒋金辉之手。

台湾的歌仔戏也深受崇武人的雅爱，崇武镇上就有三个歌仔戏剧团。据说，过去常请台湾的歌仔戏剧团来崇武演出。如1933年春，聘请台湾歌仔戏剧团“双珠凤”来崇武演出七天七夜，轰动全城。

---

①《崇武所城志》“生业”。

②《崇武所城志》“碑记”。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闽台的传统关系已经中断了三十八年，崇武和台湾两地亲人的正常往来以及经济、文化上的传统交流都蒙受到不应有的限制和损失。可喜的是，自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从两岸的历史现实出发，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政策。使台湾海峡逐渐成为和平的海峡，这些政策得到了台湾岛内外的人们的广泛支持和理解。在这一新的格局下，我想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供领导和同志们参考。

首先，我们要充分发挥崇武在闽台关系中特殊优势。崇武港作为福建省的一部分，在历史上确实对开发、建设和繁荣海峡两岸，对发展闽台两省传统的特殊关系起过自己的重要作用。而闽台两省从长远的观点看，要实现真正的稳定和繁荣，那就应该携起手来，谁也不能离开谁；福建离不开台湾，台湾也离不开福建。历史和现实都需要崇武利用自己的优势，发挥自己的作用，为促进闽台“三通”进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特殊贡献。

其次，崇武是闽台之间的窗口，她会使海峡两岸消除由于宣传造成的隔阂和误解。崇武港是天然的渔业良港，十多年来不少台湾遇难渔船前来避风、修船和补充供给，都受到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热情帮助，使他们得以平安返回，这在台湾影响很好。我希望今后能进一步改进和加强这方面的服务工作，以利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增强他们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

第三，我们引用一句古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崇武是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古城之一，崇武更需要改革开放，振兴发展。今后前来崇武参观旅游、考古研究和探亲访友以及洽谈经济贸易和投资、设厂等事务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各国友人必将增多。为了迎接这一新形势的到来，希望政府组织和引导各地各界人士，鼓励投资，引进资金、技术，共同建设崇武，使她真正成为海陆交通发达的现代化的新港口。

最后，我借此机会也向台湾的各界人士进一言：希望台湾当局积极响应中共关于实现两岸“三通”和通过国共两党谈判，达

成祖国和平统一的一系列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大统一作出贡献；敬祈各界乡亲，捐弃前嫌，为促进这一伟大事业的实现共同奋斗。

## 明代万历年间惠安骆氏家族的 奴仆反主事件

傅衣凌 陈支平

明代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新的经济因素开始萌发，而旧的势力依然占着统治地位，各种新旧因素相互交错存在。特别是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然而它又处在旧势力的包围之中，难以顺利发展以至夭折。这个社会特点同样反映在明代中后期的主仆关系上。

在中国封建经济里，奴隶制残余曾占有一席之地，地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和维护政治特权，充分利用村社制的、奴隶制的残余，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隶属关系、租佃关系，对直接生产者实行残酷的剥削和统治。然而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的地主经济，与商品生产有所结合，地主兼营工商业的现象大量出现。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刺激下，明中叶后的许多地主，不仅使用大量僮仆以从事家庭或生产劳动，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地主、商人们以奴经商的习气。奴仆们的经济地位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这些经商的奴仆，可以离开主人的直接监督，获得商业活动的自主权，为主人和自己赚得丰厚利润。

但是，奴仆经济的发展一直受到封建关系的严重束缚，从法律规定上看，奴仆们所蒙受的社会身份的不平等待遇，自明初以

至明末，几乎没有丝毫的改变。他们的主人人们也力图维持旧的秩序，依然实行残酷的剥削和控制。这种落后的封建统治与奴仆们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是极不吻合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奴仆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不断起来斗争。因此，自嘉靖以后，奴仆反主的情况逐渐增多，《沙县志·风俗志》写道：“成弘之世，富者无缮练之御，贫者无粢肉之饮，父子相爱，兄弟相保，煦煦然若初离襁褓。……俗之美莫过于成弘者也。……嘉隆之季，已浸浸违其初矣，载历庚申、辛酉（1560～1561年）之后，干戈倥偬，竟以机械为名高，吞噬抢攘，恣以渔猎为厚利。齧齿之徒，伤鼓吻而争之锥刀之微，狺狺相搏，民之无良不特但侩而已也，而小民为甚。故贱至于妨贵，少至于凌长，小至于加大。是以一事之举，尊者权之，而卑者阴拱以掣其柄；一议之兴，贤者谋之，而不肖者号咷以阻其成。甚至强奴悍卒，得以劫其主君，不才子姓，得以挟其父老。讼狱烦滋，告诘嫖起，异方逋逃之民，又从指木教猱而升之，而世胄保家之主，惴惴然顾成业如捧槃水，尚敢出一息与之角哉？……呜呼！至无等也，至迫上也，可胜言哉！且也猾商黠奴纵子钱以助其欲，深文吏复罗织文致而巧诋之，大都白日之中，鬼瞰其宅矣。……迄沧桑屡易，兵燹迭遭，奔窜流离，不可胜计。”①

明中叶以后福建地区社会风俗的这一变化，在其他一些地方志如南安、福安、泉州等志的风俗记载中也有所反映，这说明了明中叶福建地区的奴仆反主犯上，几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近来，我们获见惠安县的《龙山骆氏族谱》②，内详截明代

①康熙《沙县志》卷一，方舆。

②《惠安龙山骆氏族谱》，手抄本，现藏惠安县档案馆，为明崇祯间该族生员骆东壁编修，清代骆氏子孙偶有续记，但至为简略。我们在查阅这部族谱时，得到惠安县志办蔡永哲先生和档案馆同志的大力支持，特致谢忱。又下文所引骆氏家族奴仆反主资料，均引自这部族谱，不另注明出处。

万历年间骆氏家族与奴仆之间的纠纷始末，对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中叶后期主仆关系的变化，又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例证。

惠安骆氏家族大致在宋末元初之际，“自光州固始避乱入闽，暂住云头村”，置有田宅产业。<sup>4</sup>其肇基始祖号“必腾公”，仅生一男，“讳天佑，字孚仲。生四子，长一麒，次一麟，三一凤，四一鸿”，之后不断繁殖，族众日益增多，到了明代弘治、正德以后，俨然成大族。

骆必腾携家移居惠安时，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等，“当播迁之始，与四仆同济时难，爰收入籍”，允其姓骆。后来二世祖骆天佑又率族众徙居惠安县二十二都玉埕里，为了照看开基祖业和先人坟墓，便将“旧置田地庄舍在云头下洋者，尽付三养男等掌管”。骆氏家族在玉埕里定居后，黄、杨、朱三姓奴仆虽与其主人异居两地，但其主仆关系依然世代存在，奴仆们不但要管理守卫骆氏家族的祖业先墓，而且每当骆氏家族春秋大祭之日，“岁供牲、纸，共应门役”。这种封建的依附关系，一直维持到明代中期，未有变更，“盖三百余年，里叟邻孩喙能道说也”。

但是到了嘉靖、万历年间，骆氏家族这种数百年来秩序井然的主仆关系，发生了突变。这个时期，正是福建沿海人民从事亦商亦盗的海上贸易活动最为活跃的时期，骆氏家族的世仆黄氏裔孙黄乾育兄弟，为了摆脱骆氏家族的依附关系，跟随安海商人冒险海上，取得成功，“一旦骤富”。于是，维持数百年之久的封建主仆关系产生了公开的对抗。《骆氏族谱》载有《忿词》一节，记述了奴仆反主的这一过程，兹摘录如下：“惠安二十二都玉埕里主忿词户长骆瑗，因世仆乱宗，名分倒置，姑述其概，俾览观者得辨玉石，庶本宗世系不至为他姓所紊乱也。……祖有随迁养男黄来保、杨成安、朱长安，俱收入籍，共支户役。祖虑世远，健奴乘主，严厉传家，族谱载详悉。……今骆乾育号安峰者，正黄来保之裔也。始无立锥之地，为桶匠治生，妻陈来定

女，弟乾任娶庆福女，二姓皆白崎村郭，李之仆佃也。世代村落，五尺通晓。伊叔成贯怜育无依，送跟安海商人为奴，颇得厚利，遂带货物往广交接倭船，……以此积奸致富，遂逞雄猾，渺视主仆分谊。今春葬父谋地占穴，掇采谱记糟粕，耸惑宦家代笔志铭，将伊祖来保改作天保，冒称吾祖必腾公长子，而抑天佑次之。以此欺瞒亲友，炫耀缙绅，识者咸切齿之。夫以来保之后裔孙子，至今称主称仆，尊卑森严，惟育移居晋邑，欺众弗察，遂蒙虎尘，乘主蔑伦，情甚可恶，神人共愤。岂不知族类子姓，斑斑谱记，纵奸诡百出，焉能以一旦之骤富，而混数百载之黑白哉！第恐闻风轻信，未袭成例，谨将乾育世仆事由遍告诸士大夫君子，共扶正气，众口交撰乱宗罪恶，知所警戢。而晋之乡宦误听缔亲者，亦不可因财而忘贵贱之羞。”以上虽然只是骆氏家族的一面忿激之词，但我们参考《骆氏家族》的其他记载，仍不难看出明中叶以后骆氏家族主仆关系所发生的如下变化。

一、黄姓世仆通过从事海上走私贸易获得经济地位以后，他们极力谋求平等合理的社会地位，敢于摆脱骆氏家族的控制和压迫。首先，他们于万历九年毅然断绝了意味着他们与骆氏家族有着主仆隶属关系的祭祀执役和奉送牲纸的传统活动。接着，他们又于万历十四年“出揭乱宗”，擅自撰刻先人墓志、修纂自家的《骆氏族谱》把自己世仆的身份，更跃居骆氏主人之上，所谓“将伊祖（黄来保）改作（骆）天保，冒称吾（骆）祖必腾公有二子：长天保，为乾育之派；次天佑，为惟俨公之派”。为了达到混乱骆氏宗族以提高自己身份地位的目的，黄姓世仆大力运用自己的经济力量，出资重贿，拉拢和分化地方乡邻以至他们原先的主人，以求得其中一部分人的同情和支持。骆氏家族中的一部分人，有的“受贿于叛仆，而假族谱以供其变”，有的则亲密往来，兄弟相称，承认其为伯族的地位。乾育葬父时，又有人“往吊以金纸，后为颂志铭”，主家之人“反拜于养男之墓”。而当骆氏家族的上层士绅地主们愤起与黄氏世仆较争时，骆氏家族中

竟有人“嗜利忘义甘心事仆”，“为之图解”，这些人公然对出首较争的生员骆日升等说：“公亡呶呶攻富贾也，正义不足以胜邪利，虚词反以谋实蓄，某固忠，公之宜自为计。”在黄氏世仆雄厚经济力量的攻击下，主家骆氏家族的统治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二、为了使自己“富贾”的身份地位得到社会的承认，黄姓世仆们利用金钱财物，广泛结交官府和地方士绅。他们盛请文人名士“并拜云头祠宇”以叙通家，“声惑宦家代笔志铭”，耀祖光宗。而官府乡绅在他们的财力面前，“亦雅相顾”。从上引的《忿词》中还可以看到，黄姓世仆在骤富以前，世代不得与平民通姻，黄乾育兄弟所娶之妻，“皆白崎村郭、李之仆佃也”，经商获利后，“乾育为子求姻，贿媒耸听于林、黄二大姓”，“晋之乡宦误听缔亲”。他们力图通过与官宦世家的联姻通婚，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三、随着奴仆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黄姓世仆们还极力谋求应有的政治地位。骆氏家族是惠安地区颇有声望的世家大族，所谓“子姓故蕃，弘正以来，蔚以文章有声”，时有子弟登科入仕。因此在《骆氏族谱》中，特辟有《宗贤纪录》一节，以记述该族历代登科入仕的情况。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世仆们的子弟也相继入庠登科，又各以骆族大姓自诩，致使主家骆氏家族大为震动，《宗贤纪录》因而一度中断记载，该族谱感慨写道：“不意仆裔登科，不便备录”。黄姓世仆热衷于跻身封建统治阶层，争取封建特权，固然反映他们反抗封建压迫的软弱性，而另一方面也足以说明明中叶以后奴仆经济地位的提高，已经有力地冲击着旧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他们以往那种极为低贱的社会地位。

明中叶以后福建地区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封建阶级结构，然而，明代中后期毕竟还是一个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无论是沿海商民的海上贸易活

动，还是山区经济的商品化，无不采取严厉的压制政策，使得这个时期新的经济因素的产生和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甚至夭折。对于这个时期阶级结构的变化，也是如此，地主阶级利用着政权的、乡族的种种力量，力图恢复旧的封建秩序，压制下层人民的人身解放和个体自由经济的发展。从惠安《骆氏族谱》的记载可以看到，当黄姓世仆起来反抗封建压迫、争取平等地位时，该家族的上层地主分子，“咸切齿之”，认为奴仆“乘主蔑伦，情甚可恶，神人共愤”，“同族子姓兄弟，苟有一念笃祖敬宗之意，传子贻孙之谋者，皆当目击心忿”。于是纠集族众，群而攻之，“齐到泉城东门二郊庙，同往于育家正名”。同时，他们还把骆氏家族与黄姓世仆的渊源关系以及所谓黄姓世仆的丑行，写成《忿词》、《辨章》，“遍粘街坊，庶晋邑士大夫君子览观者亦得共愤而切齿之”，试图唤起封建的社会压力，把已经挣得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的黄姓世仆，重新束缚在骆氏家族的隶属之下。

另一方面，骆氏家族通过加强内部管理，来达到对世仆实行严厉的控制。《骆氏族谱》中载有《倡议立字稿》，便是该家族在吸取了黄姓世仆反主事件的教训后所公议成立的规约，这个规约除了强调“倘嗜利忘义甘心事仆不敢出一言以相攻者皆非我族类”和“尚义出头之人俱刻名字列之主仆匾额永挂祠宇以垂不朽”的原则之外，还定有具体条款四则：

一、主仆混乱乃通族之羞，非一人私愤，其公费等钱，除养子孙外，照依派盐丁数均出，如有恃顽不出者，会众同取。

一、首议之人非生端喜事，以前辈尊长不敢劳烦，故不得已而任其责，如或后日生端报施首议之人，族众誓约众心同御，使后之向义者有所激励云。

一、凡同宗子姓兄弟，既议之后，如再因财之交而忘良贱之分者，查实会众鸣鼓而攻之，以为后者之戒。

一、举议正名，系祖宗重事，如有倡为不必较以阻后生之

行，此事得罪祖宗，永不许入家庙。

封建地主统治者的多方压制，不能不使明代中后期的奴仆反主斗争，受到严重挫折。

黄姓世仆虽然在万历年间掀起了一场反奴斗争的浪潮，但忠于主人的传统观念在其他一些奴仆的思想中依然牢固存在。加上地主阶级经常提倡和表彰所谓的“义仆”，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奴仆的反抗力量。当惠安黄姓世仆奋起进行争取平等地位的斗争，但骆氏家族的其他奴仆，如杨、朱二姓，对于黄姓世仆的斗争，不但不能给予坚决的支援，反而站在主人一边，共同谴责黄姓世仆。这样不能不使黄姓世仆的反主斗争，陷于孤立无援的困境地。

总之，由于以上种种原因，虽然自明中叶以后，在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作用下，福建地区的奴仆反主斗争，时有兴起。但是他们的英勇斗争，却未能冲破牢固的封建藩篱，而被地主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对于封建阶级结构的冲击，遭到了夭折。当然，明代中后期奴仆反抗斗争的成绩是不容否认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地主阶级改变他们的剥削方式，减轻劳役。但这场斗争最终并未能彻底摧毁落后的蓄奴制度，奴仆的社会地位，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变。奴仆经济的发展，也不能为新的劳动力的产生，创造有利条件，旧的势力、旧的封建秩序依然牢固存在，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变革的顺利发展，这无疑是很值得引起我们深思的。

## 崇武城卫与明代海防

杨 国 植

崇武千户所城是明初在福建沿海设防的重要城卫之一，

“初筑小兜巡检司，洪武二十年（1387年）始城其地为崇武，东门之外，复建捍寨，置戍兵，与城联络，屹然为海上巨镇”。①所城周737丈，高2.1丈，窝铺26，为门4，建楼其上。永乐十五年（1417年），增旧城，高4丈，砌东西二月城，各高2.5丈。②崇武建城的最初意图，是为了对付倭寇的侵扰，以及东南沿海反明海上势力对新生明政权的颠覆活动。明代初期，这一战略意图基本上得到实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冬，崇武所城官兵在张荣指挥下，出城接战从大岞登岸骚扰的倭寇，阻止了倭寇的入犯③是一明证。

然而，随着倭寇的沉寂和海上反明势力的平息，沿海城卫在海防上的地位，基本上下降为执行海禁政策的工具，即以查禁私人出海贸易活动为主要职能。到了嘉靖年间，沿海城卫并行海防和海禁两种职能，在历史上起着和明初迥然不同的作用。要准确地认识崇武城卫在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有必要从海禁和倭患两个侧面加以考察。

明初军事部署的重点在于北方边境线上，旨在对付蒙元残余势力的卷土重来。海岸线上，虽然北有倭寇的不时侵掠，南有张士诚、方国珍余部的逃亡海上，但未能形成对明室的主要威胁。故对于海防，采取军事防御方针，忌于海上用兵。朱元璋一方面把日本等邻国列为：“不征诸夷”，以遣使结交的手段加以羁縻；另一方面宣布：“片板不许下海”，厉行海禁，防止沿海人民私通海外诸国，“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④为了保证海

①曾承芳：《克复崇武城记》，见《崇武所城志》，碑记篇。

②张岳：嘉靖《惠安县城志》卷8，《公宇》。

③参见《崇武所城志》，明臣篇。

④《太祖洪武实录》卷231。

禁政策的实施，巩固海防，遂在东南沿海设置城卫，并对海外贸易进行统制，实行在一定限期内，由外国入贡、在中土交易的所谓“朝贡”贸易。汤和及继之的周德兴，奉命经略沿海，从方鸣谦“请量地远近，置卫所。陆聚步兵，水具战舰，则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近海民四丁籍一以军戍之”<sup>①</sup>之谋，先后在浙西、东筑城59座，在闽东、南筑城16座，是朱元璋防倭战略的具体体现。由于海禁和朝贡贸易制度的实行，最初是作为巩固海防的配套措施提出来的，因此，作为海防要塞的沿海城卫，不能不把厉行海禁、保护朝贡贸易作为自己日常例行的职责。这样，明代初期的崇武城卫，在和海外交通、海外贸易的联系上，不能不体现出正、负两种不同的功能。

明代初期崇武城卫的正面功能，是保护了官方的朝贡贸易，具体地说，是泉州与琉球国之间进行的朝贡贸易。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派遣行人杨载往谕琉球“称臣入贡”，<sup>②</sup>开始建立朝贡贸易关系。明代前期琉球国入贡的指定地点即在泉州。崇武正当泉州——琉球航道上，“盖防海岛夷之奥区，泉惠藩屏也”，<sup>③</sup>它对保全贡船安全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与此相关的，还有永乐年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包括崇武在内的沿海城卫对其所辖海域内经过的郑和船队，也起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作用。

明代初期崇武城卫的负面功能，表现在对沿海民人出海捕鱼、贸易的查禁上。以泉州港为中心的闽南海域，具有对外交通、贸易的优越条件。宋代，以泉州为主的福建海商，已经活跃于日本、朝鲜半岛以至南洋诸地。元代，随着与西亚阿拉伯国家贸易往来的发展，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泉州海商的踪迹，更

①《明史》卷126，汤和传。

②《明史》卷323，琉球传。

③戴卓峰：《朝阳楼记》，见《崇武所城志》，碑记篇。

是越过苏门答腊以西。而沿海渔民的海上活动，不仅开辟了台湾岛附近海域的渔场，而且扩展到闽海边缘的钓鱼列岛。明初所谓赐琉球闽人三十六姓中，有一部分来自闽南，并不是偶然的。就崇武而言，人多以渔为生，“大要边海捕鱼之鲜者，可贩而走惠安、晋江二处。其腊者可舟载而之三山、兴、漳等处，俱可殖焉”。“此间有不漁耕者，挟貲鬻货，西贾荆、襄，北走燕、赵，或水行广之高、琼，浙之溫、台、处等郡，装载茹榔、米谷、苧麻、杂物”。<sup>①</sup>明初实行的海禁，事实上是从宋元时的开放倒退，这不能不影响到闽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且直接影响到泉州港地位的降落。崇武城卫作为执行海禁政策的一个据点，因而也不能不发挥这种负面的作用。

明初实行的海禁政策，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策，本具有一定理由。其一，是蒙元残余势力的存在，对明朝政权的巩固构成现实的威胁。在元末长期战乱造成社会经济凋落的情况下，把有限的军力、财力集中应付主要的威胁，加强北方边卫，是当时符合现实情况的抉择。其二，由于集中军力、财力加强北方边卫，在东南海防上就不得不采守势，在必要的城卫建设之外，用断绝海陆接济、防止内外勾结的办法作为辅助，也是顺理成章的。其三，元明之际长期战乱的破坏，使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广大地区迫切的任务是恢复农业生产，对商品的需求，特别是外国货物的需求，大为减弱。虽然地主制经济本身和商品经济具有天然的联系，地主和农民都不可能从自身的经营中取得所有的生活必需品，但在历劫之后，这种对市场的依赖已下降到最低的限度。因此，海禁和筑城役民戍守一样，虽一时招致民怨，但未引起民间社会强烈的反抗。至于明室官方所需求的外国奢侈品，又能从朝贡贸易中取得。从上述意义上说，明初实行海禁，应当是利大于弊的。这也是海禁政策在明代初期

<sup>①</sup>《崇武所城志》，生业篇。